

明代皇宫中的佛教建筑与崇佛活动

Buddhist Building and Buddhist Worship by the Imperial Family in the Ming Dynasty Imperial Palaces in Beijing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何孝荣

He Xiaorong

内容提要:

明代皇帝多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北京皇宫中修建了不少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印度密教的供奉场所,包括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弘庆殿等,以及护国寺、镇国寺等。皇室在其中大肆礼佛,频繁举办各色佛教法事,进行崇佛活动。明代北京皇宫中皇家崇佛活动具有连续性、全员性、多样性、繁盛性等特点,佛教在明代皇宫中一直很繁盛。

关键词:

明代 皇宫 佛教

ABSTRACT:

Most Ming Dynasty emperors engaged in Buddhist, especially Tibetan Buddhist, worship, an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complex in Beijing there were buildings that reflected Chinese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and Indian Tantrism, including: Hanjing Chang, Fanjing Chang, Xitianjing Chang, Yinghua Dian, Longde Dian, Dashan Dian, Hongqing Dian, and Zhunfo Si, as well as the temples Huguo Si and Zhenguo Si built during the Zhengde reign period. The imperial household conducted most rites within their own quarters and would frequently organize sermons and worship. The Buddhist activities in the Ming Dynasty palaces in Beijing were continuous, total, various and rich, and throughout the dynasty Buddhism flourished at court.

KEY WORDS:

Ming Dynasty; imperial palace; Buddhism.

明代皇帝多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北京皇宫中修建了不少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印度密教建筑,以皇帝为首的皇室在其中大肆礼佛,频繁举办各色佛教法事,进行崇佛活动。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清代北京皇宫藏传佛教作了较多研究和探索,出版和发表了大批论著及资料集¹,而对明代北京皇宫佛教则研究极少。笔者数年前对明代佛教史加以考察,涉及到明代宫廷佛教史,兹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研究明代宫廷佛教史,弥补明代宫廷史、故宫佛教史以及故宫史研究的不足。

一

明朝自永乐年间在北京营建宫室、城墙,迁都北京,直至灭亡,其间,除了明世宗禁佛、明思宗有限地排斥佛教以外,其余诸帝无不崇奉佛教,对佛教加以提倡和保护。他们赞扬佛教有“阴翊王度”作用,与僧人往还讨教,大量封授和供养藏传佛教僧人及印度密教僧人,频繁在佛寺中举办各色法事〔图一〕,大肆度僧,带头修建佛教寺院,数次编修大藏经,不一而足²。由于崇信佛教,明代北京皇宫中也修建了不少佛教建筑及礼佛场所。包括:

1. 汉经厂

宋代以来,汉传佛教佛学日渐衰微,宗派不振,逐渐趋向生活修行和宗派调和的路线。明初,针对佛

教现状和民间显密法事盛行现实,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明太祖下令分天下佛教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修习³。禅即禅宗,讲即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指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主要包括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则包括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活动的僧人(名瑜伽僧或赴应僧)。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太祖又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下令禅、讲、教僧“各承宗派,集众为寺”,“清其事而成其宗”,并严禁民间“仿僧瑜伽”作法事⁴。明太祖的提倡,促进了瑜伽僧的兴旺和法事的盛行。日本学者龙池清指出:明代“教寺在寺院总数中所占比率达到四成乃至六成,由此推定,教僧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⁵。中国台湾学者释见晔的统计⁶,印证了龙池清的说法。可以说,瑜伽僧和瑜伽法事一定程度上成为明代佛教的代名词。

这一趋势在皇宫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汉经厂的设立和其中法事的举行。明代宦官刘若愚在介绍汉经厂时说:“释典具宗、教两门,而诵经持咒、劝化群生,此度世津梁,必不可缺者”⁷。这里所说的“诵经持咒、劝化群生,此度世津梁,必不可缺者”即为瑜伽教,也就是汉经厂的职责。汉经厂有宦官若干人,“每遇收选官人,则拔数十名,习念释氏经忏。其持戒与否,则听人自便”。汉经厂举办瑜伽法事,据记载,遇皇帝生日、元旦、中元等节,皇帝“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幡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其僧

1 如故宫博物院:《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陈庆英、孙国璋:《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故宫博物院:《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众神:乾隆版满文大藏经绘画》(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龙霄飞:《北京皇宫御苑的佛寺与佛堂》(华文出版社,2004年)、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郑欣森:《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

2 参阅拙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1—53;《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36—343;拙文:《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明代佛教政策述论》,载《文史》2004年第3期;《明

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 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五年〔壬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4 明释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

5 龙池清:《明代的瑜伽教僧》,载日本《东方学报》(东京)1940年第11册第1期。

6 参阅释见晔:《洪武时期佛教发展之研究——以政策、僧侣、寺院为中心》,中国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页84—85。

7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图一〕中正殿区佛堂宝华殿，殿前广场为藏传佛教法事举办地。

伽帽、袈裟、缁衣亦与僧人同，惟不落发耳。圆满事毕，仍各易内臣服色”¹。

汉经厂在皇城内东墙下，御马监北。它承担了宫中举办汉传佛教法事的职责，负责宦官平时“习念释氏经忏”，作法事时装束与“应付僧”即瑜伽僧人相同，因此实际上是宫中设立的为皇家服务的汉传佛教礼佛场所²。

2. 番经厂

所谓“番经”，就是藏传佛教经典。明朝后期张居正指出：“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窳者也。成祖文皇帝贻书西天大宝法王，延致法尊尚师等，取其经，缮写以传，虽贝文梵字不与

华同，而其义在戒贪恶杀，宏忍广济，则所谓海潮一音、醍醐同味者也”³。番经厂与汉经厂比邻，在皇城内东墙下，御马监北。

番经厂职责是举办藏传佛教法事，“习念西方梵唄经咒”，承担法事任务的也是宫中宦官。作法事时，即“凡做好事，则悬挂幡榜，惟此厂仍立监斋神于门傍。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⁴。

汉经厂、番经厂作法事之前，“须先颁旨意，传各衙门答应钱粮。其所诵经卷、所费纸札，司礼监也；桌凳、香炉等件，内官监也；铃、杵等件，御用监也；幡、桌围，针工局也；拜单、围幔、伞，司设监也；香、

1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2 参阅拙文：《明代宦官与佛教》，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3 明张居正：《番经厂记》，见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39《皇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烛、油、米，内府供用库也；炭饼、柴、炭，惜薪司也；斋供饮食，尚膳监也；钟、磬、铎、鼓、铙、钹，兵仗局也”¹。

3. 西天经厂

以前，研究明朝皇帝崇奉佛教，往往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相混而论，很少注意到印度密教，或者将藏传佛教与印度密教相混。其实，明代皇帝不仅崇奉汉传佛教，明代中期以后的皇帝尤其崇奉藏传佛教及印度密教。以印度密教而言，在明代北京，前期有撒哈咱失里、实哩沙哩卜得啰两系印度密教传承。撒哈咱失里的徒僧智光是明代最有名的显、密兼通且富译作的印度密教僧人，因此撒哈咱失里——智光一系印度密教于明代前期、中期在北京流传不绝，徒僧众多，而实哩沙哩卜得啰一系印度密教至其寂后未见有在华弘传者。明代后期，又有两位印度密教僧人——左古鲁、锁南嚷结，先后来到北京，传播印度密教²。

关于西天经厂，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六部尚书王恕等“以星变奉诏言”，其中提到：“各寺观斋醮，西天厂诵经，供应太多，费财害民”³。嘉靖二年（1523）闰四月，给事中郑一鹏上疏，批评世宗继位初“祷祀繁兴”：“比年以来，祷祀繁兴，调度弥广，有乾清宫好事，有坤宁宫好事，有清宁宫好事，有西天、西番、汉经厂好事”，“如此之类，或三昼夜，或一永日，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⁴。不久，大学士杨廷和也上疏说：“今各宫好事及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并灵济宫、显灵宫诸处，日逐俱要供给斋饭，供养等物俱必经由光禄寺造办，所费至为众多”⁵。所谓“西天”，

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对印度的通称。明代的“西天”僧，就是来自“五天竺”即印度的密教僧人及其中国徒僧⁶。西天经厂的印度密教法事，也由宦官承担，而以印度密僧或藏传佛教僧人教授。

不过，西天经厂在明代史籍中记载较少，因此不为人知。明朝后期，宦官刘若愚撰《酌中志》，书中介绍了宫中的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但没有提及西天经厂，很可能在明代后期已经圯废。至清代却有不少记载，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大西天经厂在太液池上，五龙亭之东北，大慈（悲）[真]如宝殿两壁皆绘龙神、海怪，威灵照耀。又有三大轴，所画佛像庄严而兼凛烈，形彩陆离，相传乃前明商太傅喜笔也”⁷。王士禛《池北偶谈》也记载：“今大西天经厂殿壁龙神及大轴文殊、普贤变相，亦[商]喜笔。[商]喜，宣德中授锦衣卫指挥”⁸。而最详细的记载则数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大西天经厂在五龙亭东北，山门临太液池，南向。第二层殿曰大慈真如宝殿，殿壁绘画龙神、海怪；又有三大轴，高丈余，广如之，中绘众圣像二十余，左右则文殊、普贤变相，三首六臂，每首三目二臂，合掌，余四臂擎莲花、火轮、剑杵、简槊，并日月轮、火焰之属，裸身，着虎皮裙，蛇缠胸、项间，怒目直视，威灵凛烈，金涂错杂，形彩陆离，传为商喜笔也。殿中立一小台，可丈余。台上有亭，如毗卢顶。亭中黄伞下，则西天说法像也。真如面南，周环而谛听者列如团箕，像皆尺许，范铜为之，冠簪袍笏，仪表肃然。中垂五、六线，下系一物，似机床，又如车轴，若转轮状。东西列四从神，

1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2 参阅拙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下册，页513、页590。另，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生平及其在中国传教情况，参阅拙文：《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载《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 《明孝宗实录》卷46，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下引明朝实录同此版本。

4 明郑一鹏：《辟左道以保圣化疏》，见明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5，中国基本古籍库本；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2《世宗崇

道教》，中华书局，1977年。

5 明杨廷和等：《祛异端疏》，见明张原：《玉坡奏议》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参阅杜常顺：《明代“西天僧”考略》，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

7 清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16，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8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4《商喜画》，中华书局，1982年。



〔图二〕英华殿，为明代宫廷中重要的藏传佛教佛堂。

各四尺，眉结云聚，目棱电击，猛焰慧肩，快蜂抢轩，戴银兜鍪衣、乌铠佩弓矢，仪容严毅如生，盖傀儡胎也。……三层设大士像。门前古槐数株，婆娑清荫。东有石屏，高八、九尺，上刻龙水，鳞甲飞动，在斜阳蔓草间，亦铜驼石马之类欤。左临海亭，右临海亭，在西苑门外。今废”¹。

4. 英华殿、隆德殿

英华殿〔图二〕，原名隆禧殿，“隆庆元年更名，崇祯五年撤额”²，“亦供奉佛像之所”³。英华殿在宫城内西北，供奉的是藏传佛教佛像。明人记载：“隆德殿西北曰英华殿，以供西番佛像”⁴。隆德殿在英华殿东南，亦在宫城内西北，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的场所。史称，崇祯六年（1633），“乾清宫、隆德殿

所供神佛像尽移于朝天宫、大隆善寺”⁵。

英华殿、隆德殿也都是宫中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刘若愚记载：“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钦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其中，钦安殿为供奉道教玄天上帝、举行道教法事之所。万历年间，宫中英华殿、隆德殿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万历时，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妆韦驮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马监等衙门牵活牛黑犬围侍者十余人。而学番经、跳步叱者数十人，各戴方顶笠，穿五色大袖袍，身被缨络，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执大锣，余皆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槌齐

1 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2 《明宫殿额名》，见《日下旧闻考》卷34《宫室·明二》。

3 《日下旧闻考》卷34《宫室·明二》。

4 明刘若愚：《芜史》，见《日下旧闻考》卷34《宫室·明二》。

5 明王世德：《崇祯遗录》，见《日下旧闻考》卷34《宫室·明二》。

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按五色方位鱼贯而进，视五色伞盖下诵经者以进退，若舞焉，跳三、四个时辰方毕”¹。所谓“跳步叱”，藏语称为跳“恰穆”，蒙语称为跳“布扎”，就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藏地一般在年终举行，“表示除去旧岁的鬼祟和不祥，迎接新年，平安如意”²。这些表明，英华殿、隆德殿是宫中另二处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

5. 大善殿

大善殿，又名大善佛殿，建于永乐年间，其中供奉大量佛像、佛骨等物。据嘉靖时夏言亲眼所见：“殿内有金银铸像，巨细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状”，“诸几案之上，及悬度梁拱之间，与夫金函玉匣之所藏贮者，为物尚多，不可识辩。问之守者，具云是为佛头，是为佛骨，是为佛牙，枯朽摧裂，奇离傀儡，计不下千百斤”³。大善殿内藏有如此多的“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⁴，是皇宫内藏传佛教“法物”保存数量最多、级别最高的佛教建筑。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世宗下令拆毁大善殿，在此基础上修建慈宁宫⁵。可知，大善殿旧址在宫城内西部，慈宁宫址〔图三〕。

6. 弘庆殿

弘庆殿（或作洪庆殿）是皇城中另一处供奉藏传佛教佛像的场所。《酌中志》曾记载：“洪庆殿，供番佛之所也”⁶，但具体情况没有记载，该殿也鲜为人知，明朝末年，曾任分守下湖南道的吴伯与曾私游皇城东南角的内南城，目睹弘庆殿佛像：

客有谈南城之胜者，维时已奔注吾胸。

一日，偕诸子肃冠绅而行。自东华门进，至丽春门，凡里余，碧栏红榭，盆行径松，各相映也。渐入，翻喜其邃，而虞其严，不敢恣足。导者指弘庆殿而顶礼焉，殿之中座宝璐庄严琉璃光映我佛慈悲妙相也。左右两殿，供我佛变像，蓝面赤身，具三眼，骈拇手，足肥而短，人道具焉，导者指为宝也，引之抚摩。所执皆兵刃形状，蹲而伏，其下者多人兽之怪，盖西番所供多此像。凡殿庑陈设，凤香龙草之属，类不可识⁷。

7. 其他宫殿

还有一些宫殿内也供奉有小型佛像等，如作为皇帝寝宫的乾清宫，“梁拱之间，遍雕佛像，以累百计”⁸。宫城前部的文华殿，是皇帝与文学侍从讲论学问之处，其东室“有释像”，即雕塑有佛像。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崇道禁佛的明世宗“以其不经，撤去”⁹。

上述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弘庆殿以及乾清宫、文华殿等，基本上是明初时新建，其中的佛像供奉以及佛教法事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乃至明末，可以说是皇宫中常态的、制度性的佛教活动场所。

二

正德年间，明武宗极度崇奉藏传佛教，因此不再满足于宫中所设的常态的、制度性的番经厂等宗教场所，而是又在宫中兴建佛寺，延处藏传佛教僧人，与他们诵经、演法其中。明武宗在宫中兴建的藏传佛

1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2 弘学：《藏传佛教》页22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3 明夏言：《夏桂洲文集》卷14《议除禁中释殿及毁销佛骨疏》，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4 《明世宗实录》卷187，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

5 《日下旧闻考》卷33《宫室一·明》。

6 《酌中志》卷17《大内規制纪略》。

7 明吴伯（舆）[与]：《内南城纪略》，见清黄宗羲：《明文海》卷35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明佚名：《烬宫遗录》卷上，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9 《明世宗实录》卷120，嘉靖九年十二月丁丑。



〔图三〕慈宁宫及其后殿，是太后等人礼佛的重要场所。

教寺院有：

1. 护国寺，正德五年（1510）武宗建。正德二年八月，武宗下令在宫城西华门内“盖造豹房公廨、前后厅房、并左右厢房、歇房”¹。此豹房是武宗给自己修建的离宫、公廨，始建于正德二年，以后陆续建造房屋，武宗“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²。正德五年（1510），武宗在其中创立“护国禅寺”，与藏僧“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³。六年二月，大学士李东阳揭露说，“自去年夏秋以来，外间传闻豹房内添盖房屋，又闻竖立幡竿，似有创立寺宇之意”，“禁中创造寺、观”，“番僧人等往来混杂”⁴。九年正月，十三道监察御史罗缙等批评武宗“误听番僧幻妄之说，使出入禁城，建寺塑佛，崇奉逾侈”⁵。监察御史施儒等

指斥武宗“皇城之中，创盖寺宇，以处番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⁶。十月，刑部主事李中更是指责武宗“于西华门内豹房之地，建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异言日沃，忠言日远”⁷。

护国寺有佛像，有藏传佛教僧人，有自称藏传佛教大庆法王的明武宗，佛、法、僧三宝具备，是皇宫中名副其实的藏传佛教寺院。

2. 镇国寺，正德七年（1512）武宗建。清人称：正德七年十一月，武宗“诏建镇国寺于大内西城”⁸；“镇国寺，正德七年敕建于大内西城。今无考”⁹。所谓“大内”，即皇宫。该寺在明代记载甚少，或与豹房护国寺为一寺。

3. 延寿庵，正德八年（1513）武宗建。明人雷礼

1 《明武宗实录》卷 29，正德二年八月丙戌。

2 《明武宗实录》卷 29，正德二年八月丙戌。

3 《明武宗实录》卷 24，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4 《明武宗实录》卷 72，正德六年二月己亥。

5 《明武宗实录》卷 108，正德九年正月丙戌。

6 《明武宗实录》卷 108，正德九年正月丁亥。

7 《明武宗实录》卷 117，正德九年十月甲午。

8 《日下旧闻考》卷 42《皇城》。

9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 4《皇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

记载,正德八年正月,武宗“诏建延寿僧寺堂释殿于西内”¹。明末清初人查继佐记载与此相同²。所谓“延寿寺”,即延寿庵,实为内安乐堂之佛堂。

明代宦官崇佛,连宦官衙署中也设有佛堂、佛庵,甚至“以梵宇为私廨”³。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延寿庵在羊房夹道路西,庵基颇狭,栋宇无多。院墙南面有康熙中重修碑记,庵内有嘉靖六年钟一,上铸‘延寿庵及内府安乐堂佛堂永远供奉’等字。是安乐堂在西内经厂,延寿庵则其佛堂也”⁴。可见,内安乐堂在皇城内西北,羊房夹道路西,由明武宗兴建,为内安乐堂宦官所用佛堂。

正德年间武宗在宫中所建护国寺、镇国寺,可称为暂时的、违制性的佛教寺院(延寿庵供宦官使用,与皇家佛教法事无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与前述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弘庆殿等皇宫中常态的、制度性的佛教场所截然不同。因此,武宗死后,清算其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之弊,宫中护国寺、镇国寺就再也没有音讯,大概被平毁了。

三

如上所述,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弘庆殿等建筑,分别是皇宫中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印度密教佛堂,是供皇家礼佛、举办佛教法事、进行崇佛活动的场所。至于武宗所建护国寺、镇国寺,则是武宗诵法念经的佛寺。除此以

外,史籍中还有一些明代皇家在北京皇宫举办佛教法事、崇信佛教活动的记载。

洪武年间,朱棣为燕王,驻守北平(北京)。北平为元朝首都大都,藏传佛教曾盛行一时⁵。虽然明初藏传佛教上层退出北平,但北平的藏传佛教影迹并未散尽,所谓“历辈葛哩麻(噶玛巴)既皆躬来大都,为元朝帝师,成祖为燕王时,自不难于元代故都闻其声名。且当时元亡未久,耳目犹接,大都伽蓝理宜尚有番僧踪迹”⁶。“靖难”之役中,建文二年(1399)四月白沟河大战,“阵亡军士积骸遍野”。燕王朱棣“念之,命收其头骨,规成数珠,分赐内官念佛,冀其轮回。又有脑骨深大者,则以盛净水供佛,名天灵碗”,这种做法“皆胡僧之教也”⁷。所谓“胡僧之教”,即藏传佛教。以亡人头骨为供佛法器,正是藏传佛教密宗的做法。可见,朱棣崇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明太宗实录》作“哈立麻”)“道行卓异”,朱棣为燕王时已知其名,即位后(成祖)派人往征,希望他“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⁸。噶玛巴应召到南京后,“日日为皇帝次第说法”,“又译经呈上”,并被“延请进宫,建立坛城,为皇帝授无量灌顶”⁹。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明太宗实录》作“昆泽思巴”)“有道术”,成祖也派人往征。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贡噶扎西应召到达南京,为成祖“讲授诸多佛法”,“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奥之法,使其如愿以偿”¹⁰。其后,贡噶扎西又为成祖“传授灌顶和

1 明雷礼:《皇明大政记》卷20,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2 《罪惟录》帝纪卷11《武宗毅皇帝》,四部丛刊三编本。

3 《日下旧闻考》卷39《皇城一》。

4 《日下旧闻考》卷41《皇城三》。

5 参阅拙文:《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与大都敕建佛寺》,载《文史》2009年第1辑。

6 韩儒林:《〈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载韩儒林:《穹庐集》页42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7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

8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页1001,民族出版社,1986年。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94,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9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页1001—1011。转引自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10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页231—239,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108。

经咒加持、教诫、随许等诸多佛法传授，使其心满意足”¹。成祖仰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先后两次召请，但宗喀巴因格鲁派初创，且身体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释迦也失代替入朝。据说，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²，为成祖所崇信，后归藏，至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请。成祖迁都北京，新盖宫殿，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³。对于汉传佛教僧人，成祖也多次召入宫中，与之讨论大藏经编修，赐给斋饭，请其观赏元宵节宫中灯火等⁴。

仁宗也崇信佛教。他礼敬名僧，名僧南洲溥洽“以老宿数被召问，礼遇特厚，命居庆寿寺松阴精舍以自佚”⁵。他在宫内举办佛教法事，对此，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指出：“中国自太祖皇帝以来皆好佛事，洪熙最好，亲设水陆”⁶。所谓“水陆”，又称水陆法会，是佛教施饿鬼会之一，即施斋食供养水陆有情，以救拔诸鬼的法会。

宣宗经常召僧人入宫，讲经说法，举办佛教法事。僧止翁慧进“究通华严宗旨，旁达唯识、百法诸论”，有“法主”之称。宣德年间，“待以国老”，“诏于内翰因多官并僧众对写金字《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尚膳供饌”⁷。僧道孚“传唯识大义，通涅槃大旨”，宣宗为皇太孙、太子时，“每承顾问，恩礼特隆”。宣德年间，道孚“左右朝参，出入禁中”，“常

于文华殿楷书大字斋额”，“又常设施食于内庭，利济天人，开法场于秘殿，为民请福，敷演瑜伽华梵，阐扬三乘真诠”，在宫中举办法事。宣宗“为改容坐听，击节叹赏，以为灵山胜会，今古一时”⁸。印度密僧实哩沙哩卜得啰精通五明，宣宗继位，被“复诏入京，广宣秘密”⁹，主持斋会。宣宗还“诏上殿，翻译诸佛坛仪，颁行于世”¹⁰。

正统年间，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坐食膏粱之美，身披锦绣之华，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¹¹。“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宫中番经厂、西天经厂等地频繁举行印度密教、藏传佛教法事，掌坛和教习者是智光的徒弟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当时，“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¹²。三曼答室哩于正统初年“督启各色坛场，念诵真乘”¹³。

景泰年间，僧古心道坚传临济宗，又精通藏传佛教，为代宗所崇信，“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¹⁴，“假祈禳入内殿诵经”¹⁵。

天顺年间，英宗继续召请印度密僧入宫教授及举办佛教法事。智光弟子禅牒室哩，天顺元年（1457），“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诸戒”，“甚得师祖撒

1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页231—239。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页109。

2 参阅杨贵明、马吉祥：《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页273，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明孝宗实录》卷155，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

4 《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

5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25《僧录司右善世南洲溥洽法师塔铭》，中华书局，1998年；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25《南洲溥洽法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二》，中华书局，1980年。

7 《补续高僧传》卷4《慧进传》。

8 明胡濙：《敕建马鞍山万寿大戒坛第一代开山大坛主僧录司左讲

经孚公大师行实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页9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9 明释澄澄纂修、（民国）释印光增修：《清凉山志》卷2《大圆照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10 明世宗：《重修圆照寺碑记》，见王学斌等：《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页145—147，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 《明英宗实录》卷183，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

12 明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页99。

13 明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页142。

14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天顺初元盛德》，中华书局，1959年。

15 《明英宗实录》卷275，天顺元年二月己亥。

哈咱失里板的达之正传”¹。智光另一弟子三曼答室哩，天顺二年“敕于内府番经管教中贵官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举皆成就”²。汉经厂佛事，则由僧然胜等教授，然胜头衔是“僧录司左街讲经、前奉诏校雠三藏、广善戒坛传戒宗师、智化寺开山、特恩旌表孝行、承旨提督汉经厂教经、兼敕建大兴隆寺第四代住山”³。

宪宗对佛教有浓厚兴趣。他平时读阅佛经，并召人入宫抄写佛经。史称，宪宗“于燕闲之余，游心释典”。他“阅《法华经》而说之，命近臣下经馆，择能书者[书之]”，又“诏书《金光明最胜王经》”⁴。士、僧书写佛经者，还能得到提拔。如，僧东白定皑精通释、儒，“成化初，被选入大内汉经馆书文”，先后受命书写《法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授阶左觉义兼主香山永安寺”⁵。除了宦官们在番经厂的藏传佛教法事，宪宗还经常召请藏僧入宫，诵经行法。早在即位初，宪宗就招藏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⁶，后因首辅李贤劝谏，暂止招请。李贤去世后，宪宗故态复萌。成化二年（1466）十一月，他赐弘善妙慈灌顶大国师札实巴诰命⁷。三年十二月，他又封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为法王、西天佛子等。其原因，《明宪宗实录》解释说，札巴坚参、札实巴等“以秘密教得幸”，“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赐予骍蕃”⁸。宪宗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⁹。所

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¹⁰。成化后期，宫中召请藏僧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更甚。宪宗死后，大臣们揭露说：法王领占竹、札巴坚参、佛子释迦哑儿答、国师舍刺星吉等“献顶骨数珠，进骷髅法碗，以秽污之物冒升赏之荣”¹¹；“上渎先皇，售其邪说，遂致崇侈名号，大创法场，糜费财力”¹²；“斫骷髅以为法碗，行净至宫，穿朽骨而作念珠，登坛授戒，遂使术误金丹，气伤龙脉，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宫车晏驾，百官痛心，万姓切齿”¹³，甚至说宪宗之死都与之有关。

弘治初年，孝宗对佛教注意整顿和限制，但宫中皇家佛教法事活动并未停歇，所谓“各寺观斋醮、西天场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续进番僧，刊印番经，既费民财，又伤礼教”¹⁴。弘治中期以后，孝宗一改初政，对佛教加以崇奉，大肆在宫中举办佛教法事及其他崇佛活动。清宁宫新成，有旨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大学士刘健等认为违制，孝宗却辩解：“宫殿新成，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其置之。”既而，府、部、科、道又“各极言其不可”，孝宗坚持己见说：“庆赞之事，乃因旧典举行，此后事朝廷自有处置。”¹⁵汉传佛教僧人东白定皑，成化年间曾选入内廷书佛经，弘治初，“罢写经”，寻复召入，“供奉如故”¹⁶。

明武宗最为崇奉藏传佛教。孝宗死，武宗即位，

1 明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页99。

2 明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页142；明李纶：《重修普照寺碑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页22，中古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明英宗：《智化寺颁藏经圣旨》阴题名，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页37。

4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9《应诏挥毫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篁墩文集》卷29《应诏挥毫诗序》。

6 《万历野获编》卷27《主上崇异教》。

7 《明宪宗实录》卷36，成化二年十一月癸巳。

8 《明宪宗实录》卷53，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9 清张廷玉：《明史》卷331《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

10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札巴坚参》。

11 《明孝宗实录》卷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12 《明孝宗实录》卷6，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己酉。

13 《明孝宗实录》卷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14 《明孝宗实录》卷46，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

15 《明孝宗实录》卷155，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

16 《篁墩文集》卷29《应诏挥毫诗序》；《明宪宗实录》卷189，成化十五年四月丙午。

即令藏僧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各率其徒，假以被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滥设斋醮”¹。正德二年（1507）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²。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³。

武宗在宫中违制兴建护国寺、镇国寺，延住藏僧，“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⁴。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是：“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⁵武宗迷恋的也是“秘密教”，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时宫女“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⁶。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也’”⁷。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1510）六月，武宗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给诰命”，“大庆法王，盖上所自命也。及铸印成，定为天字一号云”⁸。

明世宗在历史上以崇奉道教、禁绝佛教而闻名。实际上，世宗也曾曾在宫中崇奉佛教，举办佛教法事。

嘉靖二年（1523）闰四月，工科左给事中安磐上疏说：世宗继位初，纠改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之弊，“奈何甫及二年，遽袭故辙，不斋则醮，月无虚日”⁹。大学士杨廷和等也上疏批评说，“今乃无故修设斋醮，日费不貲，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此皆先年乱政之徒芟锄未尽，妄引番、汉僧、道试尝上心”；九卿乔宇等亦言：“陛下登极诏书首正法王、佛子、国师、禅师之罪，搜访内府宫观出入引诱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号，及新建寺宇尽行拆毁，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内建立坛场，溷渎神明，烦劳圣体，不可之大者也。”¹⁰每年“初度”，即世宗生日，礼部“援例请于朝天等宫、寺建斋，以为祈寿福者”¹¹。这些寺观，包括朝天宫以及“内三经厂、外二寺”。“内三经厂”指番经厂、汉经厂、道经厂，“外二寺”所指不明。嘉靖六年七月，世宗决定“将内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其两宫景命等日皆照旧行”¹²。至此，嘉靖朝的藏传佛教法事才真正停废。

隆庆年间，对番经厂、汉经厂加以重修。弘治十年（1497）二月，番经厂罹火灾，“焚毁无遗”¹³。后来，大概有所修复。至隆庆年间，“岁久亦渐圯焉”。隆庆五年（1571），穆宗染疾，“因命重修，为祈祝地”¹⁴。汉经厂大概同时重修。张居正称，“初，禁垣艮隅有番、汉二经厂，其来久矣。[穆宗]庄皇帝尝诏重修，以祝釐延颺”¹⁵。

万历年间，李太后、神宗等人对佛教狂热地崇奉，

1 《明武宗实录》卷1，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

2 《明武宗实录》卷24，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3 《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4 《明武宗实录》卷24，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5 《明武宗实录》卷121，正德十年二月戊戌。

6 清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

7 转引自佐藤长：《明代チベッ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いて》（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

8 《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9 明安磐：《黜异端以隆圣道疏》，见明张卤：《皇明嘉隆疏钞》卷5，

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0 《明世宗实录》卷26，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

11 《明世宗实录》卷78，嘉靖六年七月己巳。

12 《明世宗实录》卷78，嘉靖六年七月己巳。

13 《明孝宗实录》卷122，弘治十年二月甲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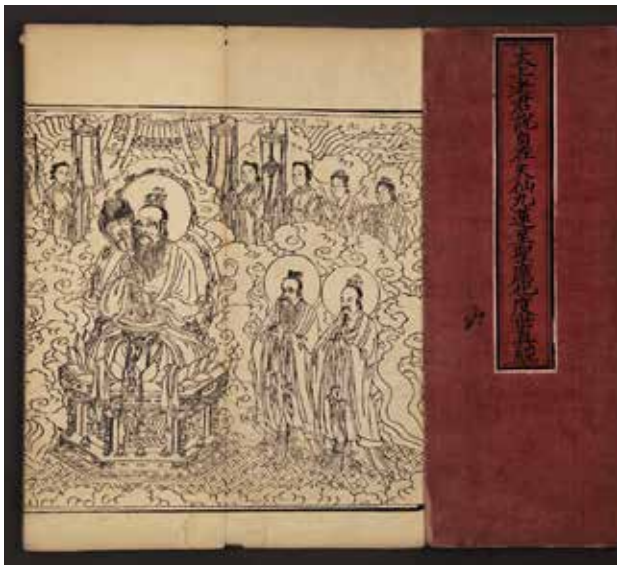
14 明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卷2《敕建万寿寺碑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5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12《敕建万寿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再次掀起宫廷佛教的热潮。李太后“好佛”¹，“崇信佛乘”²。为了“资福”去世的穆宗、保佑小皇帝神宗，她“大作佛事”³。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太后死后，神宗上尊号为“九莲菩萨”（据时人张士范的偈序），并于万历四十四年编造、刊刻出《太上老君说自在天仙九莲至圣应化度世真经》〔图四〕。神宗还在宫中立殿塑像，所谓“奉御容于‘英华殿菩提’树之东北别殿，……因上尊号曰九莲菩萨云”⁴，“宫中像作九莲座”⁵。

除了“九莲菩萨”，神宗还将李太后比作观音菩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藏李太后石刻像拓本，镌大士像，凭槛趺坐，背景竹林一片，有鹦鹉栖于枝上，栏外池中莲花十二朵，白三红九，一小童合掌立于池中。石刻上端中间篆书“御制”二字，两侧双龙拱之。下端左侧篆书方玺“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下镌楷书：“赞曰：惟我圣母，慈仁格天，感斯佳兆，阙产瑞莲，加大士像，勒石流传，延国福民，霄壤同坚”。字凡六行。左侧署：“大明万历丁亥年造”⁶。按，“万历丁亥”即万历十五年（1587），神宗以李太后作观音菩萨，这方石像被广泛印刷、传布，所谓神宗“尝于太后千秋节，为太后祈福，敕取内库所藏吴道子画观音像，临抚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页，以布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⁷。

神宗虽然将李太后渲染、塑造为菩萨，但她毕竟不是菩萨，她还要向现实中的佛教名僧皈依。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月，名僧憨山德清入京贺李太后寿，李太后欲延入宫，“面请法名”。德清不敢，“绘



〔图四〕《太上老君说自在天仙九莲至圣应化度世真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现存北京法源寺佛教图书馆。

像命名以进”。她“悬像内殿”，令神宗“侍立”，“拜受法名”⁸。德清弟子众多，法派四十字，偈云：“德大福深广，慈仁量普同。修持超法界，契悟妙心融。寂静觉常乐，圆明体性通。慧光恒朗照，道化久昌隆”。其中“德”为其自己辈名，“大”则是李太后辈名，“命弟子名，自福字辈始”⁹。对佛教“圣物”，李太后也虔敬有加。万历二十年五月，僧达观真可在石经山得函贮佛舍利。李太后闻之，“欣然喜，斋宿三日”。六月，“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仍于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复加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内，以为庄严。出帑银五十两，乃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八月，“复安置石穴”¹⁰。外国“供绿刺观音一座，其高六尺”，李太后“迎供慈宁宫中”¹¹。宫中番经厂，隆庆年间重修未完，万历初年继续重修竣工，番经厂中久已中

1 《明史》卷114《慈圣李太后传》。

2 民国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8《明庐山法云寺沙门释德清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 明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2《修五台山风林寺下院方顺桥大慈宣文寺碑记》，台湾高雄净宗学会，1998年。

4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5 《明史》卷120《悼灵王慈焕传》。

6 参阅周绍良：《明万历年间为九莲菩萨编造的两部经》，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

7 清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见清胡敬：《胡氏书画考三种·南熏殿图像考》卷下，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8 明释福征：《憨山大师年谱疏》卷上，河北虚云印经功德藏，1994年。

9 《憨山大师年谱疏》卷下。

10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2《涿州西石经山雷音崛舍利记》。

11 清曾灿：《过日集》，见《日下旧闻考》卷35《宫室·明三》；（清）杨凤苞：《秋室集》卷8《云林寺借秋阁观明慈圣李太后赐画九莲观音像》，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断的藏传佛教法事也得到恢复。

神宗“万机之暇，尤复游心内典”¹，研读佛经。为了补充宫中佛经等的不足，他经常谕令司礼监及乾清宫宦官到宫外购买，“凡竺典、丹经、医卜、小说、出像、曲本靡不购及”²。他经常抄录佛经，以为功德。他曾“手书《金刚经》，汗渍册纸，疑当易，亟遣中贵驰问[僧真可]”，真可阿媚之，以偈进曰：“御汗一滴，万世津梁。无穷法藏，从此放光”。神宗览后“大悦”³。他“金书《佛说眼明经》十二卷，为慈圣[李太后]祝釐”⁴。时人称其“手书梵夹端庄，无纤微苟简，凡以祈母后万年也”⁵。

神宗崇信佛教，“皈依净土”⁶。为了向佛教输诚敬礼，他选僧代替出家，皇太子、诸王出生，也都“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⁷。不仅如此，神宗还受菩萨戒。律宗名僧古心如馨，据说在五台山见文殊菩萨现身，被称为“优波离尊者”，尽得律学之奥，嘉、隆间至南京古林庵，“登坛说戒”，“遂称天下第一戒坛”⁸。神宗“特敕延至五台[山]，命司礼中官张然代受菩萨戒”⁹。神宗从僧如馨受菩萨戒，也就把自己视作佛教中人、僧如馨弟子。其后，如馨卒，神宗又“诣悯忠寺，请顶相入大内供奉”，亲为题赞曰：“瞻其貌，知其人。入三昧，绝六尘。昔波离，今古心”¹⁰，表示出对师僧的皈依和尊礼。

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¹¹。神宗还恢复了汉经厂中的汉传佛教法事。汉经厂诵经做法事，原来皆以宦官为之，神宗又益以宫女，“选经典精熟、心行老成、持斋者[宦官]数

员，教习宫女数十人，亦能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经，若尼姑然”¹²。

王皇后等人也多崇信佛教，皈依僧人。当时来华的传教士著作中提到，“有许多偶像寺院的和尚住在皇城中，名声显赫。他们不仅把百姓，而且把很多显贵乃至宫廷里的后妃，都引入歧途。他们通过使者和后妃们联系”。其中，最著名的僧人是达观真可和憨山德清，“一些后妃选择这两人中的一个作为导师，在位的皇后养成向达观穿的法衣顶礼膜拜的习惯，因为她不能离开宫廷，而达观作为一个僧人又被禁止入宫。据说，她表示过希望皇帝也会选择他当师傅”¹³。郑贵妃曾“泥金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卷在瓷青纸上，梵本刻丝锦装”，卷首题云：“大明万历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贵妃郑谨发诚心，沐手亲书金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卷，恭祝今上圣主，祈愿万寿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她“楷法秀整”，经前“绘佛像，甚精细”¹⁴。

光宗似乎也崇信佛教，有替僧万庵，在京西磨石口承恩寺“代光宗舍佛”¹⁵。宫中赵选侍崇佛，天启年间被太监魏忠贤逼杀，临死时，将光宗所赐首饰等“列于案桌之上，沐浴礼佛，西向遥拜，痛哭良久，从容投缳”¹⁶。

天启年间，熹宗也有一些崇奉佛教举动。如，天启五年（1625）五月，熹宗在西苑驾舟游玩，不慎落水，同舟的两名宦官高永寿、刘思源被淹死。熹宗令“赠升乾清宫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贤（指太监魏

1 清释道忞：《布水台集》卷15《敕赐五莲山护国光明寺心空开法师塔铭》，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2 《酌中志》卷1《忧危弘议前纪》。

3 明陆符：《达观大师传略》，见《明文海》卷421《仙释》。

4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54上《圣光永明寺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 明陆符：《达观大师传略》。

6 《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盛衰》。

7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12《敕建承恩寺碑文》，续修四库全书本。

8 民国释仁友：《金陵马鞍山中兴律祖事迹考》，清末刻本。

9 清佚名：《清凉山志》卷14《灵感下》，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0 清佚名：《清凉山志》卷14《灵感下》。

11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12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13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页437—438，中华书局，1983年。

14 清厉鹗：《玉台书史·宫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明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13《游西山诸名胜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16 《酌中志》卷《两朝椒难纪略》。

忠贤,引者注)亲赴大高玄殿作法会瞻礼,放河灯追荐之”¹。《天启宫词》中的一首咏曰:“高玄法会演孟兰,个个西僧紫袖宽。泽畔魂归幡影乱,波罗蜜供佛灯寒”。其词注曰:“西苑溺死暖阁二人,赠升乾清宫管事。是年中元,命忠贤于大高玄殿作佛事荐之,甜食房制进波罗蜜为佛供”²。番经厂举办藏传佛教法事,原来皆以宦官担当,据说天启元年以后,“奉旨以宫人为之”³。张皇后也崇奉佛教,“常用白绫间新桑色绫,制衣如鹤氅式,服之礼大士像”⁴。她“尝用素绫作地,手剪五色绫,叠成诸佛菩萨妙相。宫人奉释教者,互相仿效”⁵。其时,宫中“素多茹菜事佛者”,故宫词咏曰:“宫瓶秘色露葵萼,入供丝丝绘佛图。翠靥金蝉常卸却,萧然一样似皇姑”⁶。

崇祯五年(1632),思宗在徐光启影响下,一度拆毁宫中的佛教及道教神像。时人记载,“崇祯五年秋,隆德殿、英华殿诸像俱送至朝天等宫、大隆善等寺安藏”⁷,即指此事。但是,宫中崇奉佛、道的势力编造“灵异”,加以阻挠。《崇祯宫词》咏曰:“百华幡盖护金颜,灵迹独留殿陛间。争此一重门户隔,朝来香火是尘寰”。其诗注云:崇祯五年秋,思宗“谕隆德、英华殿诸像俱送朝天宫、隆善寺等处”⁸。其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明思宗也曾试图向佛教诸神乞求保佑和帮助,宫中佛像有所恢复。崇祯十三年(1640),为了解决军饷缺乏问题,他再次命将宫中供奉的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兵饷。但不久,外戚们“交通宦官、宫妾”⁹,乘皇五子慈焕病危,倡

言“九莲菩萨”指责思宗苛求外戚之过,“历数毁坏三宝之罪”¹⁰,言毕而死。思宗大为诧异,“于宫中大作斋醮”¹¹,超度天子。然后,他又令人把以前搬出殿外的偶像搬回宫中。这一年,他又封已故生母纯孝太后刘氏为“智上菩萨”¹²。崇祯十四年,他“以天步方艰,物多疵疠,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普陀大士”¹³。十五年正月,他“斋于南城,每子刻同中宫往诵佛,移时还宫”¹⁴。番经厂例于中元节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思宗“同后妃幸后苑湖中,置酒水殿,内侍僧、道两班作法事,施食放灯”¹⁵。十五年七月,田贵妃死,“是年法筵倍盛于旧”,“特追荐之也”。《崇祯宫词》咏曰:“鸣锣叠鼓觉凄凄,今岁孟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¹⁶

四

最后,在上文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试对明代皇宫中的皇家崇佛活动的特点加以简略总结。

第一,明代皇宫皇家崇佛活动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如前所述,明代皇宫中的崇佛活动,基本上从明初延续到明朝灭亡,即使是禁绝佛教的嘉靖年间、排斥佛教的崇祯年间,皇家崇佛活动仍未停止。或者说,佛教一直活动于明朝的皇宫中,渗透到皇家日常生活里。

第二,明代皇宫中的皇家崇佛活动在人员上具有全员性。明代皇宫中,上自皇帝,中及后妃,下至诸王、

1 《酌中志》卷10《逆贤乱政纪略》。

2 明蒋之翘:《天启宫词》,见《明宫词》页6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清史梦兰:《全史宫词》,见《明宫词》,页178。

4 明秦征兰:《天启宫词》,见《明宫词》,页19。

5 明秦征兰:《天启宫词》,见《明宫词》,页34。

6 明秦征兰:《天启宫词》,见《明宫词》,页52。

7 《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

8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见《明宫词》,页83。

9 《明史》卷253《薛国观传》。

10 清文秉:《烈皇小识》卷6,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1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见《明宫词》,页101。

12 清谈迁:《北游录·纪卮下》,中华书局,1960年;(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5《圣慈天庆宫记》,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3 民国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卷4《檀施》,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14 清谈迁:《国榷》卷98,崇祯十五年正月,中华书局,1958年。

15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见《明宫词》,页102。

16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见《明宫词》,页107。

公主，基本上都崇信佛教。在我们接触到的史料中，还没有发现一位完全不崇信佛教的皇家人员。这实际上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科学知识以及佛教的宣传鼓动所决定和造成的。

第三，明代皇宫中的皇家崇佛活动在教派上具有多样性。明代皇家崇奉的佛教，不仅有内地传统的汉传佛教，而且有北京（大都）一直盛行的藏传佛教以及来自印度的印度密教。汉传佛教不仅包括禅宗，而且有净土宗、律宗等，藏传佛教大概也有萨迦派、噶举派以及格鲁派等，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而明代皇宫中最为盛行的，则是各色佛教的法事，尤其是藏传佛教、印度密教的各种坛场法事等。这是明朝宫廷佛教的鲜明特色。其目的，无非是所谓的为皇家祛灾避邪，满足皇帝腐朽生活的需要。

第四，明代皇宫中的皇家崇佛活动在规模上具有繁盛性。皇家在宫中的崇佛活动，既有日常向佛像礼拜，又有定期、不定期举办佛教法事，还包括召请僧人进宫说法、皇室人员读写佛经、修建佛寺等，表现形式多样，规模盛大。可以说，明代皇宫中的皇家崇佛活动一直很繁盛。或者说，佛教在明代皇宫中一直很繁盛。

综上所述，明代皇家崇佛活动促进了宫中佛堂建筑和活动场所的增加，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赵中男）